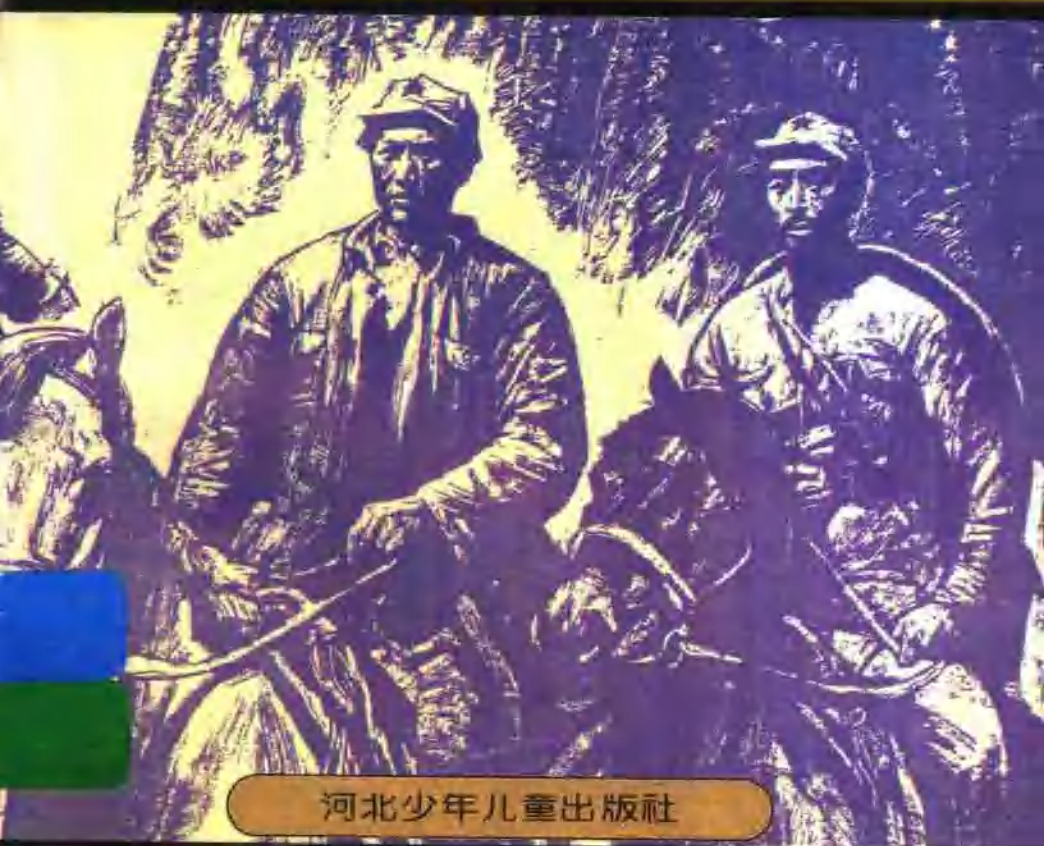


CHANGZHENGRENHUACHANGZHENG

长征人

2

话长征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长征路上的邓大姐·····	顾玉平(1)
难忘的深情·····	袁以辉(8)
特殊的连队特殊的班·····	白志文(13)
跟随董老长征·····	钟珠瑞(22)
总司令关心“红小鬼”·····	刘江萍(30)
刘伯承讲课·····	丁甘如(33)
战友情深·····	莫文骅(36)
大青山下粟铁匠·····	朱镇中(42)
踏上艰难的征途·····	裴周玉(51)
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·····	李聚奎(67)
攻打湘南要塞宜章城·····	黄振棠 黄荣贤(78)
奔袭城口·····	曾保堂(89)
红旗插上道州城头·····	杨成武(100)
撕开敌人第四道封锁线·····	李天佑(107)
湘江大血战·····	杨成武(115)
红八军团苦战湘江·····	袁 光(127)
壮烈牺牲在湘江之侧·····	韩 伟(136)

用生命架通红色电波·····	袁 光(147)
强渡乌江·····	杨得志(156)
突破乌江·····	杨成武(165)
敢教天险把路开·····	黄朝天(182)
中央红军（第一方面军）组织序列·····	(188)

长征路上的邓大姐

顾玉平

《中国建设》刊载过一篇专访，题目是《坚定的信仰，不懈的奋斗——访邓颖超同志》。其中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一节，比较具体地述说了邓大姐在长征路上的一些情形。作为一名老战士，长征时期又在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身边工作过的我，读来倍感亲切，也倍受教育。邓大姐说她长征路上“不算正式战士”，而是“休养连的一名伤病员”，这是她的自谦。长征路上的邓大姐，虽然她积劳成疾，不能担负更多的工作，党安排她在休养连随队前进，但她作为一名战士，她依然坚持战斗着，她是一位坚强乐观的战士，慈爱的大姐。

慈爱的大姐

一方面军长征行至湖南、广西交界的时候，一天，康克清指导员和周副主席给我说，要我到邓大姐身边去，把

原在那里的一位同志替换下来。当时我只知道邓大姐有病，但不知道是什么病。她在休养连，黄瘦黄瘦的，平时行军常常坐着担架。

到了邓大姐那里，她笑咪咪地看着我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多大了？什么时候参军的？开始我有点拘束，因为是头一次到女同志身边工作，所以正言正语地回答了她。邓大姐见我这样窘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说：“顾玉平同志，我看你有点紧张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熟悉了就好。这里的工作不复杂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上队伍，不要掉队。另外，这里有几个同志，抬担架的，挑担子的，喂牲口的，你协助照管一下。再就是我有病，这里没有炊事员，你把饭弄一弄。大家在一起了，有什么问题多商量，你看行不行？”邓大姐一席话，和颜悦色，我的拘束也就少了许多。我觉得她就像一位分别多年的亲大姐一样，慈爱、厚道，虽然刚见面时有些腼腆，但说过一些话之后，也就亲近了。

当时，大家都亲热地喊邓大姐“小超同志”。她的行囊不多，一条毯子放在牲口背上，书、文件和一些换洗的衣服、药品则放在洋铁箱里，由一位同志挑着，一个饭盒放在我的背包里。还有一个马灯，也由我提着。行军时，她有时坐担架，有时骑牲口，遇到不好走的路，常下来走一走。

邓大姐吃东西也很简单，主要吃稀饭，或吃点面糊糊，稠一点就行了。菜是没有的，有时能买到点咸菜就不错了。邓大姐是北方人，喜欢吃面食。偶尔搞到点面

粉，煮些面疙瘩，或摊个小饼子，她也就高兴得很。煮饭虽说是我的任务，可一到宿营地，邓大姐自己也常常动手。一次，我正在煮饭，邓大姐说我手艺不错，问我以前做过饭没有？我说我母亲死得早，父亲娶了个后母，后母比较刻薄，常常叫我淘米煮饭，所以从小还是做过不少。水平也就是不把饭煮生，谈不上什么手艺。邓大姐听我这样说，很是同情我，说：那你还是吃过不少苦，从小就没了娘。现在革命了，仍然要吃苦。我们革命者，就是以苦为荣。现在我还有妈，是个医生，她很想和我们一道走。但没有办法，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，只好让她留在苏区。

长征时钱粮那么困难，但邓大姐丝毫不曾计较过，有吃大家吃，有用大家用。遵义会议以后，为了迷惑敌人，红军突然掉头往南到扎西。一天下午，敌人来轰炸，贺子珍同志不幸中弹，伤了七八处。这时，大家都没有进房间，在树林里过了一夜。邓大姐就睡在担架上。因为紧张，第二天起床时，我慌慌张张，也来不及检查一下，结果走了一段路，我往身上一摸，发现口袋里装的几块银洋没了。我大吃一惊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几块银洋是卫生部发给邓大姐用的呀，得回去找！我急得一身汗，赶紧报告：“小超同志，小超同志，不好了！银洋掉了，我得回去找。”邓大姐见我急成这样，不但没有责怪我，反而用好言抚慰我说：“顾玉平同志啊，算了。丢了就丢了，回去找很危险。我们有了人就有一切，赶紧往前走吧。”

情同手足

部队行到广西时，我害过一次胃肠炎，病了好几天，又吐又拉。开始，邓大姐看我有情况，就说：“顾玉平同志，你休息休息吧，这里的事，能做的我自己做，不能做的还有其他同志招呼。”后来，我断断续续地掉队了，有时白天掉队，晚上跟上，有时晚上掉队，白天跟上。邓大姐见我很吃力、疲乏的样子，问道：“顾玉平同志，你抗得住抗不住？抗不住不要硬抗，我这里还有点药，你拿点去吃吧。”当时药品缺得很，邓大姐身边带的药也很有限，我哪能动用她那点应急用的药呢。我赶紧说：“不用吃药，我抗一抗就过去了。”这样，硬着头皮又走了两天。等到赶上了部队，邓大姐不容我分说，叫医生看了看，给我打了一针，从这以后，在长征路上我再也没闹过肚子痛了。

邓大姐对我是这样，对其他同志也是如此。那天过一道小河，替邓大姐挑行李的一位同志，因为冷得站不稳脚，不小心滑倒在河里。我们赶紧把他拉起来，邓大姐指挥我们在树林子里生起篝火，想让他暖和过来。但这位同志却不幸牺牲了。为这事，邓大姐伤心得流了泪，几天没吃好饭，时常念叨着这位战士。

使我终生难忘的是，在翻越夹金山时，要不是邓大姐的热情关照，我几乎要丧生在那里。夹金山上空气稀薄，气候寒冷，头也有点昏沉沉，真想坐下来休息一下。

起初邓大姐关照我说：“顾玉平同志，要坚持啊，可不能掉队。你不行的话，拉着牲口的尾巴。咬咬牙就过去了。”后来，实在不行了，风雪吹得我睁不开眼，连拉牲口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手一松，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上。邓大姐回头一看，连忙勒住马缰，呼唤着我：“顾玉平同志，顾玉平同志！你怎么样？”我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小超同志，我怕不行了。”她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那皮包里不是有药吗？吃它几颗就好了。”我摸了摸身上的皮包，里头是装着给邓大姐的药。邓大姐见我有点迟疑不决，连声说：“你快吃啊，还等什么？不要耽搁了时间。”听着邓大姐亲切的话语，浑身好像增添了不少力量。我摸出两片药，往口里一塞，站起身，跟上邓大姐，终于翻过了这座大雪山。

女中英杰

邓大姐参加革命比较早，经受过各种考验，是一位坚强而又乐观的大姐。在长征路上，虽然她重病在身，但当同志们问到她的身体时，她总是笑呵呵地回答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！”和周副主席见面时，周副主席问她情况怎么样，她也是很乐观的，从不愁眉苦脸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，长征到贵州。一路上，由于红军处于被动地位，损失较多，干部战士当中都有不少议论和情绪。但邓大姐似乎胸有成竹，并不悲观。第一次打下遵义城，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。遵义当时有老城、新

城之分，中间隔着那么一条小河。我们住老城，睡在一所学校里。周副主席住新城。住下以后，我们去看了周副主席。路过河边时，听到有叫“卖黄谷包”的声音，邓大姐对我说：“走，我们看看去。”上前一看，原来卖的是苞谷面做的一种包子，黄灿灿的，样子怪好看。邓大姐笑着说：“你看，他知道我们跑累了，特意在这里慰劳我们！买几个吧。”回到住处，邓大姐拿出“黄谷包”，一人一个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好像把征途的疲乏、劳累一齐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红军过夹金山以后，周副主席开始患病，到毛儿盖时，持续高烧不退，直至昏迷，几天不能吃东西。后来，经过抢救，用冰雪退烧，情况有所好转。在周副主席患病期间，邓大姐不顾体弱有病，日夜守护在跟前。有时我们劝她休息，她总是说：“没关系，只要恩来同志能早日康复，我掉那么几斤肉也是值得的。”紧接着，为了甩脱敌人的重兵围截，中央决定从没有人烟的草地插过去。过草地时，邓大姐自己也病了。她咬紧牙关，不吭一声，直到巴西，已经拖得不成人样了。当时，来看她的同志，一个个都难过得掉了泪。但邓大姐依旧信心百倍。

到了陕北的瓦窑堡以后，周副主席的几个警卫员都先后去住学，准备上前线了。周副主席要我暂时再呆一段时间。后来到了保安，我向周副主席提出了上前线的要求，并缠着邓大姐，要她在周副主席面前替我说话。经过再三要求，周副主席还是同意了。临走时，邓大姐握住我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顾玉平同志，这两年你辛苦了。

希望你到新的岗位上，努力学习，立场坚定，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辈子。胜利以后，我们再见面吧！”想着邓大姐这两年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、教育和帮助，想着就要离开慈爱的邓大姐，我禁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。

编者注：

本文节选自《星火燎原》丛书之（2）——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专辑》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，编者在文内增加了小标题。



难忘的深情

袁以辉

红军从瑞金出发的第三天，我和李贻玉、叶德胜三个病号就掉队了。我们互相搀扶着，头昏脑胀，脚重如铅，迈着踉跄的步子往西追赶部队。本来半天就能到达九堡镇，却走了整整的一天。

暮色笼罩着九堡。这个小镇往日是一派繁荣景象，现在却变得冷冷清清。老百姓都疏散到山里去了。

我们走到一家门口轻轻地叩门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老妈妈打开半扇门，以惊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我们一阵，惊喜地说：“啊呀，是红军同志！快，快进屋里坐。”

我们问她家里有几口人。老妈妈长叹一声说：“我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去了，前天，啊，大前天了，都跟大部队往西去了。我那老头子和大媳妇挑着东西往山里亲戚家去了。唉，红军同志，苏区这么多红军和老百姓，还打不赢反动派？”

怎么说呢？前四次反“围剿”都打赢了，为什么第

五次就打不赢呢？我们也说不清楚。

我回答不了她，便引开话题说：“老妈妈，我们三人因病掉队了，今晚想在您家住一晚。”

“啊呀，我这个老懵懂，只顾说话。看你们一个个脸黄手肿的，是什么病呀？”老妈妈说着，又从头到脚看了我们一遍。当她得知我们是“打摆子”（疟疾）时，安慰我们说：“不要紧，在我家住吧，我还有个能治这种病的土药方子哩。”

这些天就是因为缺药，得了病不易好，我们才掉队的。于是，我们赶紧问老妈妈是什么药方。

“吃个狗崽，包你们好！”老妈妈望着我们语气肯定地说。

听说吃狗崽，我们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地摸摸自己的口袋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多少钱，不能白吃群众的东西而违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

老妈妈见我们迟迟疑疑的，便说：“唔，不相信？我敢担保见效。”

“老妈妈，你们这里的狗崽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什么多少钱一斤。我家里有能吃的，你们尽管吃，不吃，难道还留给白狗子吃！”老妈妈说着便向里屋唤了几声。顿时，一条约三斤重的小黄狗摇头摆尾地跑了出来，先向我们“汪汪”地吠了几声，经老妈妈喝住，就在她身前身后摇着尾巴打转转……

“红军同志，你们哪个会宰狗？动手吧。”老妈妈恳切地要求我们。

我把嘴巴凑在李贻玉和叶德胜耳边告诉他俩，我还有两个银毫子和十来个铜板。他俩也说还有点钱。我们商定翌日临走时给老妈妈付钱，然后就把小狗崽杀了。

我们虽然饥饿，但因病身体虚弱，吃了一半多便吃不下。老妈妈真热心，她一边说要多吃点才见效，一边拿勺子往我们碗里添，看着我们连汤都喝光了，才高高兴兴地去洗了碗筷。

晚上，我们跟老妈妈聊了一会儿便睡觉去了。半夜，李贻玉叫醒我，高兴地说：“班长，我出了身汗，觉得轻松多了。吃了狗崽真见效啊。”

这些天来，我第一次见李贻玉这么高兴。我摸摸自己的身体，汗涔涔的，头脑也觉得清醒多了。我兴奋地说：“我也是这样。老妈妈这土药方真见效。”

叶德胜打着呼噜，我摸摸他的身体，热乎乎的。大概狗肉在他的身上也生效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起床了，三人都感到头脑清醒，步履轻松。我们把钱凑拢放在桌上，正要向老妈妈告别，却见她端出饭菜，叫我们吃了饭走。啊，我们并没有告诉老妈妈早晨走呀，可她天不亮就给我们做好了饭菜。顿时，我们都感到浑身热血沸腾。老妈妈催促：“快吃，吃饱了好赶路。”

我们是含着热泪吃这顿饭的。饭后，我们千感谢万感谢，恋恋不舍地向老妈妈告别。她告诉我们，等会儿在路上再出身汗就会全好。她还嘱咐我们，要是见了她的儿子，告诉他要一心一意打白狗子，不要惦念家里。

上路后，李贻玉乐呵呵地说：“做梦也没想到狗肉能治好摆子病。将来革命胜利了，我要弄它十几条狗。”

叶德胜也精神愉快地说：“李大个，你想打摆子？还是嘴馋？”

昨天这个时候我们都沉默着，担心能否赶上部队；现在却高兴地说笑着，觉得与部队的距离缩短了。

正说笑间，后面传来喊声：“红军同志，等等，请你们等——等！”

我们回头一看，只见老妈妈颠颠簸簸地追来。她走到我们面前，生气地说：“红军同志，你们小看我老婆子了。”说着，就将我们留给她的钱往我手里塞，“留着路上用吧。”

我赶紧推辞：“老妈妈，这只是表表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请收下，莫嫌少。”

“你们的心意我明白。白匪军拿十块大洋也莫想吃我的狗崽毛，你们吃我的十条狗崽肉，我也不要一个钱。我的心意你们也应该明白啊！”

老妈妈十分认真，如果硬要她收下钱，她一定很生气了；不给呢？我们却违犯了纪律。这真使我们左右为难。

老妈妈不容分说，硬是把钱塞进了我的口袋，用力推着我们上路，并喃喃地说：“来日你们打回来，比给我什么都高兴。”

我们怀着对老妈妈崇敬的心情，沿着“红星”路标昼夜兼程赶路。第四天，终于在宽田赶上了自己的部队。

政委曾三同志和校长刘光甫同志见我们赶上了队，问寒问暖。同志们都围拢过来，问这问那。我们将经过说了后，同志们都沉浸在那无限深情的回忆中：在那清澈的小溪边，伴随着歌声笑语，是谁在为红军洗军衣？在那幽静的深夜，萦绕着低吟的歌声，是谁在为红军做军鞋？在那锣鼓、爆竹声中，是谁欢送自己的亲人当红军？在那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，又是谁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红军伤员……

编者注：

本文节选自《星火燎原》丛书之（2）——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专辑》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。



特殊的连队特殊的班

白志文

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，红三军团五师在广西灌阳新圩镇，阻击装备精良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的三个师。我们十五团在阵地的左翼，在反击敌人第四次集团冲锋时，一颗子弹从我的左肩窝射进，击穿了左肺，打断了两根肋骨，我昏了过去……

特殊班里的红军战士

醒来时，天刚过午，我被担架抬着，随着部队正行进在通往黎平的路上。护送我的警卫员钟元辉同志告诉我，是李天佑师长派人抬着我过了湘江，准备送我到中央纵队休养连。

刚从江西出发时，我就听说成立了一个中央纵队休养连。躺在担架上，我默默地想着：

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连队呢？”

傍晚，部队到达黎平附近的一个小村子，我被抬进了一所院子。

“何军长！”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九三〇年时我的老上级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同志。他正在招呼一些妇女和伤员。

听到我的喊声，他转过头看到我，走过来说：“白志文同志，你也来了！”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问他。

“你还不知道呀，这是中央纵队休养连，由卫生部长贺诚管理，我是连长。”长工同志说着指向一个人，“他是党支部书记！”我一看，惊讶地叫了声“董老！”我认识董老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瑞金红军大学里。那时，我是上干队学员，他是上干队政委。

董老走过来说：“白志文同志，你负伤了？”

“嗯，伤在肺上！”

“好好休息！”董老关照过我，又去照看别人了。

何长工同志告诉我，中央纵队休养连分三个班：一个老头班，有董老、徐老、谢老、吴老、林伯渠、陆走一等一些年大体弱的中央领导同志；一个妇女班，有邓颖超、贺子珍、肖月华、李坚真等同志；还有一个伤员班，目前只有五个伤员，配备一个四十多人的担架队，要准备走远路。

听完长工同志的介绍，我想，这真是一个特殊的连队……

“白志文！……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。